

劳动力迁移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李 聪¹, 李树茁², 费尔德曼³, 邵秀军¹

(1.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3. 斯坦福大学 莫里森人口与资源研究所, 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市 94305)

摘 要: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 结合中国当前劳动力外流这一显著人口动态特征,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2008 年在陕西周至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 探索性地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西部贫困山区, 迁移户与非迁移户的生计资本在数量上有显著差异; 农户家中是否有成员迁移对家庭生计资本的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受到迁移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 不同的迁移特征对农户家庭不同的生计资本影响也不相同。

关键词: 劳动力; 迁移; 迁移户; 农户; 生计资本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0) 06-0020-07

The Influence of Labor Out-migration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in Rural Mountain Area of Western China

LI Cong¹, LI Shu-zhuo², Marcus W. FELDMAN³, TAI Xiu-jun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3. 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94305, US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labor out-migration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s by employing the data obtained from a household survey in China's Zhouzhi mountain area carried out in 2008.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s of livelihood capital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household has family member who migrated out. The degree of the influence of migration varies among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also exert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s.

Keywords: labor force; migration; migrant household;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

一、研究背景

生态与生计脆弱性以及家庭资产配置与转换上的有限性是中国西部山区贫困农户的典型特

收稿日期: 2009-12-28; 修订日期: 2010-07-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0855)。

作者简介: 李聪 (1982-), 河南新乡市人,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劳动力流动与农户生计。

征。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大量劳动力从农林用地上释放并外出务工,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①成为中国转型时期重要的人口特征,对农户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劳动力迁移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但迁移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农户资本配置和转换的有限性,并在以传统农林业采集为主的生计模式之外给农户带来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真正地摆脱贫困,依然值得关注。

根据“生计资本”的相关理论,农户所拥有的资源和禀赋被划归为五种生计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1]。这五类生计资本不单是构建生计策略的资源禀赋,更是对抗贫困的可行能力。迁移通过交换家庭劳动力的使用权提升了家庭占有其他资本所有权的能力和机会^[2],这种所有权从横向看是一种可行能力,纵向看是农户自我发展的能力,迁移对于能力贫困的影响,最终落脚在五种生计资本的变化上。

本研究在微观层面上探索劳动力迁移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在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基础上,从代表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生计资本出发,将农户不同资本进行整合和量化,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验证迁移对于生计资本是否有影响。第二,在迁移户中比较不同迁移特征对于生计资本的影响。

二、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生计资本”的概念来自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将代表农户能力和权利的资源禀赋归成五种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用于生产产品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水和环境服务);金融资本(用于消费和生产的现金以及可获得的借贷);物质资本(除自然资本外用于生产的物质,如基础设施和生产工具);人力资本(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社会资本(为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网络和各种组织)^[3]。农户的贫困是由于生计资本的有限性与不可及性而造成的,而迁移带来了资本建设的契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的限制,从而改变着家庭的贫困状态。

许多学者把汇款视为迁移作用于生计资本的主要途径,关注的焦点是汇款在消费或生产投资之间的选择,但无论投向如何,汇款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贫困家庭的信贷约束,影响了农户对物质、人力、社会及自然资本的投入。首先,汇款直接增加了家庭收入与储蓄等金融资本。在此基础上,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成为汇款的优先选择,墨西哥农村地区低龄少年低文盲率和低辍学率都与当地的高汇款现象呈强相关关系^[4];汇款还被用于家庭成员健康与医疗的支出。此外,汇款也被用来购买农具、建设住房等物质资本的投资,亚当斯(Adams)在巴基斯坦的研究发现,汇款对于增加灌溉土地的面积有着显著影响^[5]。汇款用于典礼仪式和其他公共活动等消费,这种“地位主导性”的消费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有时甚至占据了汇款的大部分^[6]。可见,汇款的影响涉及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外出家庭成员通过汇款增强了流出地家庭生计资本的不可及性,并促进了生计资本的积累。

迁移本身也直接和间接影响着家庭的生计资本:“干中学”的积累和溢出效应提高了迁移者的人力资本^[7]。迁移者在流入地构建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后来者从中获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从而提高了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8]。回流无形中提高了社区的人力,并带来跨国和跨地区的网络^[9]。此外,迁移可能改变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迁移家庭可能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资,从而提高家庭人力资本的存量^[10]。迁移给自然资本带来的重要影响是投资农业生产以及土地流转,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发生的土地流转规模很小。此外,与迁移相关的一些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特征也影响着农户生计资本,包括家庭外出人数和地域等,这些特征在涉及迁移的相关实

① 本文中,迁移主要是指在本县外乡镇或县城以外的地方从事非农打工并累计一年内超过三个月的行为,不包括因工作、上学、婚姻、参军等其他因素发生了户籍变化的行为。迁移户是指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家庭。

证研究中被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11]。

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和积累水平低，贫困脆弱性高。对生计资本的投资和运用受制于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缺失，面向市场实现生计资本社会融合的程度极低。而迁移是农户基于当地社区自然条件、政策限制和资本约束下所做出的家庭决策，加之传统家庭观念的存在使得外出成员与留守家庭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研究迁移对生计资本的影响还要充分考虑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因素。这些家庭因素包括户主^①特征、人口特征和地理位置。户主拥有对家庭重大事务，如家中劳动力迁移和生计资本使用的决策权；家庭抚养负担是影响家庭人口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负担小的家庭生产性强，会有更多产出转化为资本^[12]。家庭的地理位置决定着农户迁移决策以及资本的可及性。社区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经济积聚有明显影响的地理临近性以及基础设施^[13]。

已有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基础。可以看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可能是造成农户之间生计资本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西部的贫困山区普遍生计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迁移可能会对农户的金融、人力、社会、物质和自然资本带来积极的影响。此外，在迁移户中，汇款的数量、外出的人数等迁移的特征也可能对家庭生计资本产生影响，但不同的资本所受到的影响不同，其具体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取决于农户所在地的具体环境。

三、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 2008 年在陕西周至南部山区进行的贫困农户生计专项调查。调查地位于秦岭深处，农户贫困脆弱性较高，当地严格的生态政策限制了传统农林业生计。退耕后，外出务工已成为当地农户的首选，调查样本中的迁移户占 57.3%，说明该地作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的调查地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的对象为农户“家中年龄为 18~65 岁之间的户主或户主配偶”，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按照自然生态条件先确定 4 个乡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各乡镇的行政村按收入水平分为高、低两层，并考虑各村地理位置、生计类型与人口数量等差异，每层抽取 2 个村，共计 16 个行政村；之后对每个村调查期内的全部常住户进行入户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基本人口情况、各类生计资本及迁移的相关信息。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录入过程中，课题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质量控制，之后又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整理，最终获得 1074 份有效问卷。

2. 指标构建

(1) 因变量。本研究选取农户五种生计资本的量化指标为因变量。以往涉及五大资本分析多以定性为主，近年来五大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以及测算方法的建立，使人们可以用定量的方法剖析农户各类资本水平^[14]。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结合调查地实际情况，在对各指标重要性做定性判断的基础上，将各生计资本所含内容进行萃取，分别合成五个指标以体现五种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由于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的办法进行处理^②，经过处理之后的数值介于 0 和 1 之间，数值越趋近 1，代表这一类型的资本在样本中的相对水平越高。具体的指标选取和计算公式如表 1 所示。

(2) 自变量。根据文献和调查地实际情况，将自变量归为三类。迁移因素包括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出打工（迁移户）、外出人数、年汇款量和是否省外打工。外出人数、年汇款量为连续变量；是否省外打工为二分类变量，纳入第二类模型分析迁移特征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① 本文的“户主”以户口本为准。在农村地区，户主通常是家中权利地位最高者，本文所在调查地的情况亦是如此。

② 极差标准化计算公式： $Z_{ij} = (X_{ij} - \min X_{ij}) / (\max X_{ij} - \min X_{ij})$ ，本文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所属生计资本的类别进行划分。

家庭因素中包括了户主特征、人口特征和地理特征。户主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教育和外出经历。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参照类为小学及以下；年龄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模型；家庭人口特征选取家庭规模和负担比^①两个指标，均为连续变量；家庭地理位置是以房屋位置是否临近公路为标准的分类变量。

表 1 生计资本指标选取与计算表

资本类型	测量指标	指标符号	指标公式
人力资本 (H)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H ₁	$H = H_1 * 0.4 + H_2 * 0.2 +$
	男性成年劳动力	H ₂	$H_3 * 0.2 + H_4 * 0.2$
	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H ₃	
	培训和技能	H ₄	
自然资本 (N)	人均实际耕种土地面积	N ₁	$N = N_1 * 0.5 + N_2 * 0.5$
	人均实际耕种林地面积	N ₂	
物质资本 (P)	住房情况	P ₁	$P = P_1 * 0.6 + P_2 * 0.4$
	生产工具、交通工具、耐用品	P ₂	
金融资本 (F)	获得现金借贷的机会	F ₁	$F = F_1 * 0.33 + F_2 * 0.66$
	家庭现金收入	F ₂	
社会资本 (S)	农户的亲朋网络支持	S ₁	$S = S_1 * 0.33 + S_2 * 0.33 + S_3 * 0.33$
	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S ₂	
	农户家庭的通讯花费	S ₃	

注：表中指标与公式是在参考李小云等对生计资本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并经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反复比较后最终确定。

社区因素包括所在村庄是否在保护区内、人均年收入和到镇上的距离。是否在保护区内直接关系到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生计策略的选择是否受到限制，进而影响生计资本的存量；社区人均年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农户的富裕程度和社区的发展状况；到镇上的距离代表着该农户所在村庄距离商店、农产品加工点等生活设施的便利程度，这些地方也是农户出售农林产品的场所，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市场的功能，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获得与转换有着重要的影响。人均年收入和到镇上距离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模型回归。

3. 分析方法

本文将农户生计资本量化为五个指标，探索是否迁移和迁移特征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考虑到因变量为 (0, 1) 的连续数值，采用 OLS 回归会导致预测结果超出值域造成偏差，而一般线性模型 (GLM) 可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同时采用了以上两种方法来分析，但从回归的结果来看，两者在系数显著性与影响方向上基本无差异，但前者更易于解释和说明影响程度，因此，文中只报告 OLS 回归结果。回归的策略如下：首先，将所有样本纳入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在控制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的条件下，验证迁移对生计资本影响的存在性；随后选取迁移户为样本，选取不同迁移特征并加入控制变量，分析不同迁移特征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四、分析结果

1. 生计资本现状分析

表 2 提供了两类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比较情况。从总样本的均值来看：人力资本均值在五大资本中最高，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排在其次，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最低。迁移和非迁移农户的对比发现：迁移户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显著高于

表 2 迁移与非迁移农户生计资本比较

生计资本	总体		迁移户		非迁移户		t 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金融资本	0.14	0.10	0.15	0.10	0.13	0.11	***
人力资本	0.42	0.11	0.45	0.10	0.39	0.11	***
物质资本	0.18	0.12	0.18	0.13	0.18	0.12	ns
社会资本	0.06	0.07	0.07	0.07	0.05	0.06	***
自然资本	0.09	0.07	0.08	0.06	0.10	0.08	***
样本量	1074		615		459		

注：t 检验用于检验均值；***, $P < 0.001$ ；ns, $P \geq 0.1$ 。

数据来源：根据 2008 年陕西周至农户调查数据整理，下同。

① 家庭负担比 = 家庭消费人口数量 ÷ 家庭劳动力值；劳动力值 = 半劳动力（赋值 0.5，15 ~ 18 岁、18 ~ 65 岁正在读书的人） + 劳动力（15 ~ 65 岁之间的人口数）

非迁移户，而迁移户的自然资本显著低于非迁移户；两类家庭的物质资本无显著差异。

2. 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1)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3 给出了模型中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总样本中迁移户占 57%，迁移户的平均外出人数为 1.34 人，平均年汇款总量 3000 元，有成员在省外打工的农户占总样本的 26%，占迁移户的 45%，不足 1/3 的户主有过外出务工经历；在迁移户中，户主有外出经历的占一半。此外，迁移户的人口规模显著高于非迁移户，且家庭的负担比要显著低于非迁移户。迁移户中，地理位置临近公路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也显著高于非迁移户。在保护区中的迁移户所占比例显著高于非迁移户；迁移户所在社区的人均年收入也普遍高于非迁移户所在社区。

表 3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自变量	总体		迁移户		非迁移户		LR/t 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迁移因素							
迁移户	0.57	0.49	—	—	—	—	—
外出人数	0.77	0.80	1.34	0.59	—	—	—
年汇款总量	1.74	3.80	3.04	4.61	—	—	—
省外打工	0.26	0.44	0.45	0.50	—	—	—
家庭因素							
户主特征							
年龄	45.63	11.73	45.69	11.23	45.55	12.38	ns
教育							
初中	0.29	0.45	0.29	0.46	0.29	0.45	ns
高中及以上	0.06	0.24	0.07	0.25	0.05	0.22	ns
外出经历	0.29	0.45	0.51	0.50	—	—	—
人口特征							
家庭规模	3.99	1.37	4.15	1.32	3.77	1.39	***
家庭负担比	1.34	0.44	1.30	0.38	1.40	0.50	***
地理特征							
临近公路	0.17	0.38	0.19	0.39	0.16	0.36	+
社区因素							
保护区内	0.72	0.45	0.74	0.44	0.68	0.47	*
人均年收入	1.03	0.41	1.05	0.42	1.01	0.40	+
到镇上距离	18.27	15.17	18.25	15.09	18.31	15.30	ns
样本数	1074		615		459		

注：LR/t 检验用于检验分布；***,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ns, $P \geq 0.1$ 。

(2) 迁移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分析。表 4 中模型 1、3、5、7 和 8 分别提供了是否迁移（户）对农户金融、人力、社会、物质和自然资本影响的分析结果。经过对缺失值和奇异值的处理，最终进入两类模型的样本数是 1067 户和 612 户，分别用于是否迁移和家庭迁移特征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回归。由于家庭人力资本的指标包含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因而未将户主受教育程度纳入模型 3。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家庭和社区因素后，迁移对于农户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有着显著的影响，对于物质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3. 迁移特征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迁移特征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表 4 中模型 2、4、6 和 9 的回归以 612 个迁移农户为样本，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使用外出人数、年汇款总量、是否外省打工以及户主外出经历等迁移特征分别对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进行回归。由于外出成员年汇款总量是构建农户金融资本的重要指标，因此，未将外出成员的年汇款总量纳入模型 2。

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外出人数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金融和自然资本无显著影响；年汇款总量对社会资本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和自然资本无显著影响；家中有成员在省外打工对金融资本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自然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

和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户主的外出经历对人力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金融、社会和自然资本无显著影响。

表 4 迁移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回归结果

	金融		人力		社会		物质	自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迁移因素									
迁移户	0.07 [*]	—	0.12 ^{***}	—	0.07 [*]	—	-0.03	-0.11 ^{***}	—
迁移特征									
外出人数	—	0.05	—	0.20 ^{***}	—	0.09 [*]	—	—	0.00
年汇款总量	—	—	—	-0.01	—	0.08 [*]	—	—	0.03
省外打工	—	-0.08 [*]	—	0.02	—	0.04	—	—	0.09 [*]
家庭因素									
户主特征									
年龄	0.01	0.08	0.07 ^{***}	0.07 [*]	0.07 [*]	0.10 [*]	0.05	0.13 ^{***}	0.13 [*]
教育									
初中	0.01	-0.01	—	—	0.17 ^{***}	0.16 ^{***}	0.07 [*]	-0.02	0.00
高中及以上	0.06 ⁺	0.06	—	—	0.19 ^{***}	0.21 ^{***}	0.10 ^{**}	-0.03	-0.05
外出经历	—	0.02	—	-0.14 ^{***}	—	0.04	—	—	-0.04
人口特征									
家庭规模	0.20 ^{***}	0.17 ^{***}	0.74 ^{***}	0.64 ^{***}	0.19 ^{***}	0.14 ^{***}	0.23 ^{***}	-0.27 ^{***}	-0.27 ^{***}
负担比	-0.10 ^{**}	-0.07	-0.44 ^{***}	-0.35 ^{***}	-0.09 ^{**}	-0.10 [*]	-0.07 [*]	-0.03	-0.00
地理特征									
临近公路	0.07 [*]	0.05	0.00	0.02	0.04	-0.02	0.15 ^{***}	-0.08 [*]	-0.10 [*]
社区因素									
到镇上距离	0.02	0.06	0.05 ^{**}	0.01	0.12 ^{***}	0.15 ^{***}	-0.00	0.08 [*]	-0.01 ^{**}
保护区内	0.03	-0.21 ^{***}	-0.03	0.10 ^{***}	0.11 ^{***}	0.10 [*]	0.08 ^{**}	0.01	-0.12
人均年收入	-0.13 ^{**}	-0.07	0.11 ^{***}	0.05 ⁺	0.08 [*]	0.18 ^{***}	0.23 ^{***}	-0.10 ^{**}	0.13 [*]
R ²	0.078 ^{***}	0.083 ^{***}	0.687 ^{***}	0.714 ^{***}	0.141 ^{***}	0.172 ^{***}	0.186 ^{***}	0.144 ^{***}	0.143 ^{***}
样本数	1067	612	1067	612	1067	612	1067	1067	612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系数；***，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验证了劳动力迁移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的存在性，并探索了不同类型的迁移特征对生计资本的作用。下面就一些重要发现进行讨论并总结。

1. 以赚钱增收为主要动机的外出务工行为直接提升了家庭金融资本，但在迁移户中，外出人数的增加却不会对金融资本产生影响。一方面打工人数的增多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留在家里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有所减少，从而降低金融资本的总量。此外，到省外打工的人口多是以谋求个人发展为目的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家庭的责任，以及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无法用“利他性”假设来解释。

2. 迁移行为的发生直接引起家庭外出成员人力资本增值，导致家庭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非通过投资教育和健康。原因有三点：首先，在迁移户中，外出人数对人力资本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其次，汇款却未对其产生贡献；最后，户主的外出对人力资本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与户主年龄有关，样本中户主的平均年龄在 45 岁，中年人群接受新知识和事物的能力较差，且与新生代相比外出较早，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多是靠出卖体力，进而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的可能性和空间不大。

3. 迁移对社会资本的提高通过两个途径发生作用。第一，外出成员社会交往的扩大给家庭带来社会资本的增加，外出人数越多，可能获得的外部社会资源越多，其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第二，汇款多被用于日常的礼尚往来等社会交往活动，而不是投入教育和生产。

4. 调查所在地的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民外出开阔眼界的同时也使他们更加认识到家乡与外界的差距。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户的外迁意愿普遍强烈,这导致对家庭物质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不足,这是本文的发现同以往研究不同的一个地方。

5. 在西部山区的特殊背景下,迁移对自然资本的负向影响是本文同以往研究有所差别的另一个方面。当地生产条件较差,耕地和林地的生产效力受到限制且改善的可能性不大,迁移后留守家庭成员在耕地和林地投入人力的积极性不高;同时迁移带来了投入农林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以及非农收入对传统农业生产收入的替代。然而,在迁移户中,外省打工却能促进自然资本的积累,因为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和生产效率低下迫使许多留守家庭成员选择租种平原上的土地,因为平原的农业生产普遍机械化,恰好抵偿了有省外打工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也体现了当地农户迁移后最大化家庭收益所选择的一种策略。

总之,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农户的迁移方式和特征影响着代表其发展能力的生计资本的获得和使用,但这种提升和积累是片面和不均衡的。迁移直接影响金融、人力、社会和自然资本,而物质资本作为农户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条件,并不受迁移的影响。西部贫困山区基础设施薄弱,市场缺失等自然条件和客观环境无法为这种资本转换提供充分的保障和外部支持,要想全面地发挥迁移对于农户生产和生活的积极作用,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还需要提供一定的外部环境支持和干预。

参考文献:

- [1] Carney D. 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in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What Contribution Can We Make? [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8. 23.
- [2] Sen A.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3]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R].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righton, 1992.
- [4] Edwards A. C., Ureta 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Special Issue, 72 (2): 429 - 61.
- [5] Adams Jr R. Remittances, Investment, and Rural Asset Accumulation in Pakistan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8, 47 (1): 155 - 173.
- [6] Chami, R., Fullenkamp, C. and S. Jahjah. Are Immigrant Remittance Flows a Source of Capital for Development? [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Working Paper 03/189. Washington, DC. 2003.
- [7] 唐家龙. 论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伪形式 [J]. 人口研究, 2008, (5).
- [8] Kothari, U. Migration and Chronic Poverty [R].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2002.
- [9] Zhao 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2): 376 - 394.
- [10] 吴继煜. 劳动力流动视角的人力资本效应认知 [J]. 西北人口, 2006, (6).
- [11] Quisumbing A. McNiven S. Moving Forward, Looking Back: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Assets, Consumption, and Credit Constraints in the Rural Philippines [R]. Unpublished paper,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2006.
- [12] Bloom D. E., Canning D., Sevilla J.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J]. RAND, 1998.
- [13] 李小建. 欠发达农区经济发展中的农户行为——以豫西山地丘陵区为例 [J]. 地理学报, 2002, (4).
- [14]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赵丽霞.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4).

[责任编辑 齐明珠]